

## 【書評】

# 關於《佛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佛經語言學論集》

**編按：**北京大學的朱慶之教授與中央大學的萬金川教授，兩人一南一北，堪稱為當今海峽兩岸研究佛典漢語的頂尖學者。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既有慎篤之精神，又有前瞻之格局，不僅治學嚴謹周到，而且在傳統的研究基礎上，注入新的研究方法，以致成績斐然，佳文連篇。

最近萬教授將數年來之心血結晶結集成冊，並撰〈跋〉交待這些篇章的來龍去脈；朱教授則為之作〈序〉，為該書作了精闢中肯之評述。

一序一跋，前後輝映，文短而義深，頗有「一口吸盡千江水」之氣勢！今特索稿刊載，以饗讀者。

## 從《佛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談佛教漢語研究的任務

朱慶之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從語言學的角度，學術界對佛教漢語（佛經語言）研究的進程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二十世紀初葉開始，到八〇年代末，學者們將佛典語料當作中土文獻語料的補充來使用；第二階段從九〇年代初開始，出現了專門的佛教漢語研究，即此地所謂的「佛經語言學」。這種變化是自然的，但其意義現在還不能說完全顯露了出來，或者說還不能被人們所瞭解。在這個時候，我們讀到萬金川教授這部為佛教漢語研究鼓與呼的大作，應該說是一件幸事。

這本書是由作者近年發表的有關佛經語言學的論文重新編排而成的，那些文章我都曾仔細讀過，大有「從山陰道上行」之感。以我一己之見，其貢獻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從佛教學與語言學的雙重角度闡述了佛教漢語研究的意義——這在以前似乎還不曾有過，給人以新的啓迪。

其二，對佛教漢語研究的歷史和現狀作了全面的評述——作者對兩岸尤其是大陸的研究現狀熟悉程度之高，令人驚訝。其中最具價值的，是作者毫不留情地指出了當前佛教漢語研究存在的不足。

其三，強調了梵漢、藏漢對勘的方法對於佛教漢語研究的重要性——瞭解這一點對於佛教漢語研究的深入至關重要。

其四，對傳統的漢語語言學人才培養的缺陷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年輕學者尤其應該留意。我想借此機會再強調一下的是，不單是從事佛教漢語研究的人需要跨語言和跨文化的學術背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都需要這樣的背景。道理是如此的簡單，首先，漢民族本身就是一個在其發展的歷史上不斷與其他民族混血的民族，漢文化是一個多元的聚合體，要想對她追根溯源，沒有相關的語言和文化背景的支援幾乎是不可能的；復次，漢文化是全人類共同的財富，漢文化強大生命力的表現之一就是對其研究的國際化。這從幾百年前的西方傳教士時代就已經開始，其間經過從「漢學」(Sinology)到「中國學」(Chinese Studies)的嬗變，外人對於漢文化的研究已經從古到今，從文史哲到政經法，無所不包。當國人往往因「只緣身在此山中」而「不識廬山真面目」時，站在異文化立場上的他們卻顯示出某種優勢。因此，對於國人來說，瞭解國外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加強與其他國家學者的學術交流，其重要性決不亞於國內學者之間的瞭解和交流。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兩岸大學的中文系大都沒有真正領悟到這一點。

因此，在我看來，這本論文集裡儘管也有一些十分精彩的微觀討論，但這並不是一部關於佛教漢語具體問題的研究專著，而主要是一部有關佛經語言學學術史和方法論的專著。

本書能夠達致如此的學術成就，與作者獨特的學術涵養是密切相關的。關於這一點，讀者當不難體會。我有點擔心的是，由於知識背景的差異，該書之中某些最有價值的東西可能會被忽略——作者偶爾流露出的被人視為另類的「哀怨」，說明了這種擔心並非多餘。

必須說明的是，我並非同意作者的全部觀點。關於佛教漢語研究所取得的成績，尤其是與漢語史研究有關的方面，我覺得作者的評價有過頭之處；對佛教漢語在漢語史研究中的地位，作者的認識也不完全到位。這可能與作者並非漢語史的專家有關。依我之見，佛教漢語的研究應是漢語歷史研究的一部分，它的最終目的是要發現和說明漢語在其發展演變過程中受到的佛教和佛經翻譯的影響。這方面目前還差得很遠。至如辛鳴靜志教授的研究，儘管我也十分推崇，但在我看來，他的佛教學色彩更濃，還算不上漢語史的，因為他並不瞭解漢語史的關注點為何。記得六年前從四川大學調到北京大學時，季羨林教授曾對我說，佛教漢語

研究最終還要靠中國的學者。我願意以自己的經驗和教訓把這句話改爲：要靠中國真正具有跨語言和跨文化背景的新一代漢語史學者。

我認識作者是在兩年半以前。二〇〇二年十月，竺家寧教授在中正大學召開首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其中邀請了大陸十幾位學者參加，我也忝列其中。開會期間金川教授送我他在《正觀》雜誌第十九和二十期上連載的文章〈宗教傳播與語文變遷：漢譯佛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所顯示的意義〉。正是這篇文章中對我的批評讓我們成了學術上的朋友。說實話，我並不習慣作者海闊天空般的思惟方式，不喜歡作者的遣詞造句的書卷氣，但是不得不承認他是個真正的行家：沒想到他對學術界，尤其是大陸學術界的佛教漢語研究的狀況如此瞭解；沒想到他對已往佛教漢語研究的成績能夠如此褒揚，而對存在的問題亦能夠分析得如此確當，一針見血；沒想到他出身中文系，卻對跟佛教漢語研究有關的印度學、藏學相關知識如此熟悉；沒想到……最沒想到的是，作者在如何研究佛教漢語，或者說研究佛教漢語的方法論上，與我不謀而合，我們都在拼命強調梵漢對勘方法對於佛教漢語研究的極端重要性，儘管這正是自己的「軟肋」。這樣看來，我們是一對「善知識」了。

今年九月上旬，金川教授應邀來北大短期講學，期間出示這部著作的校對稿，命我作序。我以爲不過是客氣的話，並沒有當真。沒想到的是，三個月之後，又接連收到他的幾封催書，大有因此而耽誤出版，將拿我是問的意思。我只好懷著恭敬的心情來覆命了。是爲序。

朱慶之 二〇〇四年歲末于北京大學燕北園

## 《佛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佛經語言學論集》跋

萬金川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二〇〇〇年七月，心中帶著一股莫名的挫折，個人離開了原先佛教學專業的工作崗位，同時也辭去了體制外佛學研究機構的所有兼職，而應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之聘，重新又回到了原先蘊育個人學術根苗的地方。此刻的我，一時之間似乎成了佛教學研究領域裡的逃兵叛將，毋須再鎮日面對素有「地獄之學」稱號（任繼愈先生語）的佛典文獻學的繁重工作。然而，在中文系傳統的學術脈絡之下，我仍被目爲是研究佛學的。雖然個人對中國佛學的興致一向並不很高，也素無任何專業性的研究，這在同道之間幾乎是盡人皆知的事情。但是，基

於多數人的刻板印象以及某種學術格局的區塊畫分，我還是得硬著頭皮開設一些與中文系相關的佛學課程，而「佛經語言學」便是其中的一門。由於個人在佛教學領域裡的長期熏習，因此在面對漢譯佛典的語言現象之際，也就自然而然地採用了原典與譯本對勘或是梵、藏、漢等文本互校的手法來進行其間的相關研究，雖然這種涉及非漢語的語文學操作模式對傳統中文系的學術脈絡來說，總是顯得有點離經叛道。

二〇〇一年四月，在一場由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中心主辦，名之為「世界宗教：傳統與現代性學術研討會」的會議上，個人向大會提交了一篇題作〈宗教傳播與語文變遷：漢譯佛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及其所顯示的意義〉的論文，而正式宣告一己的學術生涯目前即將轉進到「漢譯佛典的語言學研究」。這篇長達六萬餘字的論文，其實既可以看作是個人初入此一學術領域所繳交的讀書報告，當然這也讓個人得便而有機會廣泛地省思前此學者之間對漢譯佛典語言現象所進行的各種研究。會後在稍事整頓之餘，該篇論文則於二〇〇一年與二〇〇二年分爲兩期而刊載於《正觀》第十九期（第五—五十二頁）與第二十期（第五—八十二頁）。

二〇〇四年九月第二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長沙召開，這次會議是由湖南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出面主辦，會議期間個人又再次遇到了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的徐時儀教授，他曾私下告訴我，前揭兩篇刊載在《正觀》上的「讀書報告」，他的學生從中獲益良多云云。此外，趁這次參加會議之便，個人則在會前先行走訪了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暨東方語文學系，拜望了朱慶之與段晴兩位教授。此中前者在一次雙方晤談的場合裡提到他目前正準備著手編輯《佛教漢語研究叢刊》一事，並出示一份第一輯的草擬目錄，總共收有二十四篇的論文，而其間的作者盡是諸如許理和（E. Zürcher）與梅維恆（V. Mair），周一良與梅祖麟，乃至平田昌司與辛嶋靜志這一類學圈內的赫赫知名之士。然而，朱教授竟然希望該一叢刊的第一輯也能夠將前揭拙文一併收入，但最好能把此一長文壓縮爲兩萬字左右的論述，以方便他能夠在這本刊物裡多容納幾篇文章。個人一篇入門的讀書報告能得到此一領域裡的先進不吝翻閱，其實已感榮幸之至，而今竟有緣附於驥尾，這可以說完全出乎當時草就此文的意料。因爲原初個人撰寫該文的主要動機之一，乃在於試圖拉近「佛教學」與「漢語學」的學術間距，從而打破令人生厭的部落主義藩籬。然而，此間的佛教學界，除了若干零星的反映，諸如福巖佛學院的厚觀法師與香光尼眾佛學院的悟因法師等人之外，似乎並未引起這個圈子裡太多的注意，這一點倒是令個人有些遺憾的。

二〇〇二年九月個人參加了由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與圓光佛學研究所聯合舉辦的首屆「漢傳佛教學術研討會」，並以〈從「佛教混合漢語」的名目談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爲題，向大會提交了一篇兩萬餘字的論文。在這篇論文裡，個人一方面檢討了北京大學朱慶之教授所提出來的所謂「佛教混合漢語」的概念，同時也嘗試指出佛教文本的原典與其譯作之間，在進行理解或詮釋的過程之中難以迴避的互文關係，並希望藉由這種文本間性（intertextuality）的指出，而讓此間的一些研究者在擺脫「原典情結」之餘，能夠重新提振漢譯佛典在佛教學研究領域裡的應有地位，從而在關注非漢語的佛典文獻之餘，也能夠同時對這一批數量龐大

的中土翻譯文獻妥加利用。該文在稍事整理之後，則發表於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出刊的《圓光佛學學報》第七期（第一五三—一七〇頁）。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個人蒙主事者不棄而獲邀參加由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的首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並以〈多音介入管絃齊鳴的場景：佛典語言研究的文化二重奏〉為題，向大會提交了一篇近七萬字的長文。在這篇論文裡，個人一方面檢視了此間佛教學研究的邊陲性格以及目前中文系傳統在漢語史研究上的若干盲點，同時則更為全面地從方法學上評析了近二十年以來大陸方面在佛典語言研究上的局限與不足，並且也嘗試進一步指出未來以「中國學」為基軸而在佛典語言研究上可能的發展途徑及其學術願景。這篇長文在整頓之後，則分成了三篇各自獨立的論文而相繼發表。其一題為〈帝國的學術與學術的帝國：關於中國學與佛教學的一些省思並兼論當前中文系的漢語史教育〉，該文刊於二〇〇二年十二月號的《鵝湖月刊》（第十六—二十八頁）；其二則仍沿用了原初會議論文的題名而於二〇〇三年六月刊載在《鵝湖學誌》第三十期（第一—四十二頁）；其三是以〈佛經譯詞的文化二重奏〉為題而刊於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出版的第十八期《普門學報》（第四十七—七十八頁），而在此文刊出之後不久，南京大學的汪維輝教授則在二〇〇四年五月出版的《普門學報·二〇〇三年讀後感》中，以〈佛典語言研究有三難〉為題，回應了拙文的觀點（參見該學報第三十五—三十八頁）。

「一曲奏向浮雲外，海嶠且待天韻來」，這個標題原初是個人前揭第三篇論文裡的一個節目，而在該一段落之中拙文則針對大陸學者在佛典語言研究的方法與論題上的偏失與局限，提出了若干建議與批評，而汪維輝教授的回應，總算讓個人的這些努力沒有完全淪為空山滾鼓！汪教授此文言簡意賅，若非其人曾真正親身奔馳於漢譯佛經漫無涯際的字裡行間，實難以如實道出履歷其境的各種辛酸與艱苦。文雖淺淺而致意甚殷，其於青年後學，可謂多所啟發矣。今蒙教授慨允，爰將此文移作拙著之序，蓋空谷跂音之叩耳，乃頓覺吾道之不孤也。

此外，針對個人在該次會議所做的報告，與會的朱慶之教授也曾在會後私人的談話裡，明白地跟我說，拙文對大陸方面在佛典漢語研究上所做的若干批評，他個人其實也同樣有所反省，但礙於某種學術倫理而不太方便在這一方面多所表達，並且認為這樣子的批難與質疑能夠由一位圈子外的旁觀者及時提出，他個人倒是覺得這對佛典漢語的學術研究來說，是具有正面意義的。至於拙文對他個人學術觀點的若干批評，他個人則並不在意，因為這正是舉辦學術會議的主要目的。朱教授並且還說，大陸方面對此間有哪些人從事有關佛典漢語的研究，極其陌生，而個人何以能夠對彼岸在這一方面的學術動態，知之甚詳？我則回答他說，此間著手佛典漢語專業研究的學者，其實並不多，而關心這一方面議題的，反倒是此間佛教學界的一些研究者。至於個人在這一方面學術信息的取得，則泰半來自大陸方面的出版物，因為此間除了少數期刊之外，想要取得大陸方面的學術出版品已然十分便捷，因此勤跑專賣大陸出版物的書坊，這些有關的學術信息其實並不難獲知云云。

參與這一類國際性而純以語言學為導向的漢文佛典的研討會，對個人的學術生涯來講，其實還是一項嶄新的經驗。趁會議之便，個人也得以結識了此一領域裡若干心儀已久的專家學者。此中除了前面已經提到過的幾位先生之外，其餘諸如老而彌堅的李維琦先生以及操著一口流利華語的日籍學者辛嶋靜志先生等人，也在會議中讓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中，特別是後者，或許是基於學思背景約略相同的關係，因此他在漢譯佛典語言及其相關文獻上的著述與論文，相當合於個人的學術口味，不僅早已拜讀再三而且也對其人強烈的問題意識與博洽的經典語文能力，以及治學的嚴謹態度與獨到的見解，由衷歎服而激賞不已。然而，在會議期間私下晤談的場合裡，辛嶋先生卻語帶無奈地談到了他在目前日本學術生態裡的尷尬處境。中國語學的研究者似乎並不認同他是該一圈子裡的同道，佛教學領域裡刻板而森然的研究隊伍好像也並不願意讓他落戶其間。個人則以為這種部落主義的學術氛圍，或許只有在舊有典範神魂俱逝而新出典範昂然崛起之際，才有可能面臨瓦解與重組，而隨著漢譯佛典研究語言學轉向的大勢所趨，我們也都相信在佛教學與漢語學的傳統疆域之外，另外一片新的學術天地或將於焉成形。

二〇〇二年歲末在嘉義中正大學舉行的學術研討會，其實也同時開啓了個人對佛經語言研究的另一階段。此中的因緣乃在於該次會議期間，個人有幸與俞敏先生的得意門生——人民大學的劉廣和教授結識（據云教授目前業已退休），而他則是以運用漢譯佛經音寫語料而著手漢語中古音韻研究的大家。在一次由中正大學驅車前往嘉義市區用餐的路途上，個人有機會與劉廣和教授同座並得便和他話起當年羅常培先生利用敦煌石室文獻而著手唐五代西北方音研究的往事。記得當時個人脫口而出的一句話，便是羅先生在石室音寫語料的利用上似乎並不充分，好像有些頗為重要的音寫語料沒有為先生所留意。劉廣和教授立即正色地問我，是哪些語料未為莘田先生所注意？一時之間，個人或囁於劉教授一本正經的神情與口吻，記憶彷彿短路一般而只能吞吞吐吐地回答說，印象裡好像是某個佛經的音寫本。劉教授便沒再接腔而轉移了話題，或許是怕我太過尷尬吧！劉廣和教授可能早已忘記了後輩小子的這一段「信口開河」之言，但個人卻始終憂心於給初次見面的劉教授留下不良的印象而久久不能釋懷。

二〇〇三年開始，個人則藉教席授課之便而嘗試進行了一些佛經譯詞與佛經音寫詞的相關研究。特別是在利用了當代若干中外學者，包括劉廣和教授與美籍漢學家柯蔚南（W. South Coblin）等人於唐五代西北方音研究上豐碩的成果之餘，而著手進行了敦煌石室五件《心經》音寫抄本的校釋工作。事實上這一批文獻正是當年羅常培先生，乃至昔日邵榮芬先生等人在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或敦煌河西方言之際，不知何故而忽略掉的重要語料（當然不止是這兩位前輩學者，其實還包括諸如高田時雄與柯蔚南等人在內，在他們藉石室遺書而著手同類研究的過程裡，也一樣沒有注意到這五件敦煌石室《心經》音寫抄本）。在著手這項校釋工作的同時，個人終於也證實了自己當初在與劉教授的交談中並沒有無的放矢！二〇〇四年九月初原本欲趁北大參訪之便順道拜望劉廣和教授，並準備把這項信息讓他知道，以求能夠洗刷

個人在他心目中留下的不良印象。但不知何故，竟在匆忙的北京之行裡給遺忘掉了，而在湖南的會議上也沒有能夠見著劉廣和教授。

至於敦煌石室五件《心經》音寫抄本的校釋工作，其具體成果目前則已有部分發表在學術期刊上，其一是以〈敦煌石室《心經》音寫抄本校釋序說〉為題，發表於二〇〇四年七月出刊的第十七期《中華佛學學報》（第九十五—一一二一頁），該文隨後也在二〇〇四年九月舉行的第二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會議上做了部分宣讀。個人所以如此不畏「炒冷飯」之譏而將已發表過的論文拿到會場上宣讀，主要是以為劉廣和教授必定會參與此次盛會，因而打算藉這個場合公開向他表白個人兩年前的談話是有其根據的。其二則以〈石室《心經》音寫抄本校釋初稿之一〉為題，發表於二〇〇四年第九期的《台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七十三—一一八頁），並且〈石室《心經》音寫抄本校釋初稿之二〉的文稿，目前也已通過審查而預定將登載於二〇〇五年一月出刊的第九期《圓光佛學學報》。

二〇〇四年九月五日個人應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暨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之邀而在該校進行了將近十天左右的學術參訪活動。在北大停留期間，個人和朱慶之暨段晴兩位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進行了相當的交流。朱、段兩位教授領導的這個研究隊伍，其成員主要是來自中文系與東語系的師生，而他們研究的主軸則擺放在「佛典文獻的梵漢對勘」上。這種比較語文學的研究路數自是極度合乎個人長年以來的學術口味。因此，在這一段參訪期間，彼此真可謂是相談甚歡，而讓一己有重新又回到佛教學研究領域裡的感覺。

當然，個人相當清楚中文系與東語系攜手組成的這支研究團隊，其工作旨趣並不在於佛教義學方面的鑽研，而是針對龐大的漢譯佛典文獻，尤其是針對古、舊譯時期所譯出的那些佛典，嘗試透過比較語文學的操作方式以便能夠弄清楚它們的來龍去脈。質言之，也就是在「來龍」方面，努力釐清這一批翻譯文獻所據底本的語言形態，特別是那些可能並非來自古典梵語的語言成素，諸如中世紀西北印度方言、中古波斯語，乃至中亞地區的一些小語種，而此類研究對於大乘思想的起源以及佛教進入漢地的途徑之類的問題，將可以起一定的照明作用；而在「去脈」方面，則從中古漢語史的立場而著手闡明這一批翻譯文獻相繼在中土成立之後，究竟在語言形態上，這些翻譯文獻裡的漢語和在地的語言之間，不論在共時態或歷時態上，到底產生了哪些可能有的互動關係或是直接影響，而此類梵漢對勘或異本互校的研究路數，對於漢語史的研究來說，不僅是直接擴大了觀察漢語流變歷程的堪用語料，並且同時也能夠讓我們仔細端詳漢語沿流之中的若干內部規律及其實質的變遷所在。

在朱、段兩位教授盛情的款待之下，個人在北京大學度過了極為愉悅的時光，並針對漢語史專業的研究生做了兩場學術報告：其一是「佛教學研究的語文素養」，其二是「佛典漢語研究的現況與願景」。除此而外，並由段教授出面臨時安排了一場與東語系研究生的座談會，地點則在東語系的教研室。首先是由段教授簡單地介紹了教研室電腦裡所收錄而在中國境內發現到的各式梵文原典抄本的圖檔資料，而據說其中便包括了諸如《解深密經》與《入

中論》之類令學界垂涎的珍寶，其後便由個人以「台灣的梵語教學以及梵語文獻的研究概況」為題而向與會的研究生做了簡報。或許是由於大一新生甫入學的關係，整個略嫌老舊的校園裡卻洋溢著一片朝氣。聰明自信外加強烈的求知慾，這是個人接觸北大研究生所給我的初步印象。

二〇〇四年九月十四日揮別了北京，隻身一人搭機前往長沙，參加由湖南師範大學中文系出面主辦的第二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湖南師範大學地處景色怡人的岳麓山下，與知名的岳麓書院比鄰而居。校區內金桂遍植，入秋時節，步履其間，和風送香，卻之不散。文學院的前庭聳立著前輩學者楊樹達先生的銅像，而基座之上則書有樹達先生的名言：「溫故而不欲知新，其病也庸；不溫故而欲求知新，其病也妄。」據手書該文的李維琦教授告之，其實這兩句話正是當年樹達先生在批評黃季剛與胡適之兩位學者治學方法之餘所提出來的為學之道。

會議期間，在北京大學追隨朱慶之教授做博士後研究的朱冠明先生，在參與了段晴教授主持的「梵漢兩本《法華經》研讀會」之餘而撰寫了〈梵漢本《法華經》語詞札記〉一文提交給大會。該文利用梵漢對勘以及異本互校的手法，極其明快地處理了漢本裡若干疑難語詞的訓解以及版本上的傳抄刊刻之誤。在朱冠明先生發表論文之後，以傳統訓詁手法而治佛經詞語並卓然成家的李維琦教授便立即起身發言，稱許朱文在操作手法上是極具創意的。李教授的一番發言，也立刻讓個人回想起首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正大學舉行時的一幕場景。當時在李教授發表了題為〈如何考知佛經中的疑難詞語〉的論文之後，朱慶之教授便當下舉手發言，並且認為傳統摘句排比式的訓詁手法在處理佛經疑難詞語之際，其實是一種效率極低的方法，而藉由梵、巴等相關文獻與漢譯佛典的對勘，可以毋須如此大費周章便能直截了當地解決此類問題。記得李教授當時的回答，則說他既不諳梵語，也不通巴利文，而只能謹守傳統訓詁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並且認為這樣的方法在一定範圍之內運作，他個人也能自得其樂地處理若干問題。其言下之意頗有針鋒相對的味道。但如今他不僅稱許朱冠明先生梵漢對勘的研究手法，更鼓勵他們系上的同仁諸如陳秀蘭教授遠赴印度進修梵語，而目前嘗試以 E. Conze 譯自梵本《八千頌般若經》的英文譯本而著手對勘《道行般若經》，並進行此一意識譯本語言研究的該系博士生，據其私下所云，此一研究路數即是出自李教授的構想與授意。兩年之間，李教授的此一重大轉折或許正是其人躬親踐履了樹達先生的格言吧！然而，諸如此類在方法學意識上的深刻覺醒，則多少也讓我們感覺到在「佛典漢語研究」的領域裡，漢語文獻與非漢語文獻的對勘研究已然在學者之間取得了一定的共識，而不久的將來，這種在佛教學領域裡早已行之有年的操作手法，勢必會成為「佛典漢語研究」此一新興學門裡標準的操作範式之一。從這一點看起來，個人重返中文系也許未必真能躲得掉「地獄之學」的糾纏！

整體而言，自從重新回到中文系任職開始，個人除了進行以梵本《淨明句論》為主的兩個國科會研究計畫（九〇—二四一一—H—〇〇八—〇一一與九一—二四一一—H—〇〇八—



〇〇七），以及目前仍在進行中的國科會兩年期的《淨明句論·初品》「經典譯註計畫」之外（九二—二四二〇—H—〇〇八—〇〇一與九二—二四二〇—H—〇〇八—〇〇二），其餘的研究重點幾乎都是配合著個人課程需求而環繞著佛經語言學以著手相關的研究。目前個人這些有關佛經語言學的論述，除了〈石室《心經》音寫抄本校釋初稿〉的部分還有待更進一步的整頓與斟酌而未予以收入之外，其餘諸文則都已悉數錄進本書之中。至於「匯流第七」一章中以〈佛教學研究的語文素養〉為名的附論，則是個人應蕭金松教授之邀而為《法光雜誌·佛教經典語言專輯》撰寫的短文（原載於該雜誌第一六四期第四版，二〇〇三年五月），而該文的主要內容也是在談佛教經典語文的有關問題，因此也就一併把它給收錄在這本份量不足而稍嫌單薄的文集之中了。

誠如朱慶之教授在題給拙著的「序文」中明白指出的，個人並非漢語史專業出身，因此對於漢語歷時流變的若干成因缺乏應有的察照與關注。坦白說，這一點倒是個人必須承認而虛心接受的。至於慶之先生對個人學思不足之處的諸多指正，則可以說更指引了一己來日當該努力以赴的方向與目標。然而，就個人整體的學術志業而言，有一點似乎也有必要在此稍加澄清，那就是一己對佛典漢語的研究興趣，其實並不完全落在漢語學上，而其中有一部分則是源自於個人長久以來對佛教「在地化」（localization）問題的關切。正是因為在這一點上，「語言」便經常成為了個人探索此類問題的主要對象與重要資具。雖然如此，但是藏經閣內縱令它有「萬家燈火」，那當該也是彼此互不衝突而並行無悖的，因為這只會使得閱藏者在更為充分的多元照明之下，察見所須而圓滿所求！事實上，收納在這本小書裡的諸多論文，也正是個人在這種信念的驅使之下而著手為之的。

歲月匆匆，在知命耳順之間，於白髮徒添之際，緬懷來到中央大學而已然逝去的一千五百多個日子，除了要感謝當年接引個人前往任教的王邦雄與康來新兩位教授之外，對於那些在課堂間伴隨個人進行佛典語言探索之旅的學生們，個人實在也應該心存感激，因為正是由於他們的不吝相隨，從而沖淡了一己旅途之上的寂寥、孤單與困頓。「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佛教把這句格言稱之為「業報」。然而，一當個人驀然回首來時之路，那些離我而去的日子竟都彷彿船過無痕一般，如今所能留存下來的，似乎也只有目前這一些文字的堆積物或可見證自己昔日四年之中思想的若干沿流與變遷吧！